
燕南 66 学者沙龙 · 第 3 期

功能主义人类学与间接统治：

20 世纪中国边政学的启发

2021 年 5 月 27 日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与民族学家吴文藻从战前力推“社区研究”到战时倡议“边政学”，背后都有一个连贯的思路，即对功能主义人类学结合帝国政治的检讨，而这种结合的焦点是 19 世纪后半期到两战之间发展出来的间接统治思路。吴文藻代表了 1930 年代的中国学者对以习俗作为分隔统治之标志的清醒认识。本期沙龙邀请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做主旨报告，报告回到了间接统治思想一头一尾的关键人物，梅因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学说。梅因和马林诺夫斯基其实提供了打破初民和文明对立的知识手段，重新将文明接触的感受拉回到人类学和民族学理解的核心。吴文藻等人从社会学而入边政研究，是对这一潜在思路的重要发挥，对理解中国之国族认同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发展提供了启发。

田耕指出，20 世纪 30 年代是中国边政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学社与刊物，无论是由官方还是学者自己成立的，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其中，《边政公论》为大众所熟知，因为它是蒙藏委员会下的刊物，具有一定官方身份。但事实上，学界对于边疆研究的热情在当时达到了空前程度，也激发一系列绵延不绝的边疆调查。例如，顾颉刚和史念海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就是边疆研究的一部分，

也是受边疆调查影响的产物。此外，还有为学者所熟知的 1939 年的“国族论争”（20 世纪 30 年代国学史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辩论，集中反映出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民族国家建构所遭遇到的一种知识困境：无论是顾颉刚强调“国家一体”还是费孝通重视“民族多元”，这场知识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认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也受到边疆调查的影响。

• 中国边政学发展的三个代表性倡议文件

从 1939 年开始到二战结束，这一时期是狭义的边疆学开始登上学科建制舞台的时期，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倡议文件，其中两个是杨成志先生撰写的纲领性文件。杨成志先生是中山大学的元老，他曾受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指派，赴云南调查少数民族情况，开启了西南调查的先驱。同时，当时的教育部责成中山大学在内的一批大学组建边政学并建系，杨先生作为元老，撰写了两个纲领性文件。第三个文件则是吴文藻 1942 年发表的《边政学发凡》。这篇文章之所以是中国边政学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是因为它完整地给出了边政学建立的若干个层次。文章的核心简而言之就是“对外求民族独立，对内求民族平等”，这一目标需要通过边政学的建设来实现。边政学建设的层次的外延包括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在吴先生看来，这是边政学最外面的一层。《边政学发凡》非常强烈地转变了边政学的狭义属性，它不只是一个有实用价值的边疆研究学科，也是中国学者参与到世界政治变化中的一个工具，而后者就涉及到广义的边政学。

• 边政学的广义属性

边政学的广义属性实际上是以 19 世纪下半期到一战之间的世界历史的变化，特别是殖民体系的变化，来重新认识中国建设边政学的意义。其中有三位学者需要重点介绍。一是刘咸先生，他是留英人类学家，主要阵地是在复旦大学。由于他在留学时经常参与到欧洲的人类学的讨论中，所以非常熟悉欧洲殖民地和人类学的关系。二是黄文山先生，他是民族学会的创会会长。他在中山文化馆创立了中国民族学会，这是中国第一个高水平的人类学学术单位。三是马长寿先生，他是周伟先生的老师。马先生在建国前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为边疆民族学起到了奠基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马先生成为了一位非常出色的民族史学家。此外，马先生对于 20 世纪人类学在西方的发展有非常犀利的洞见。

• 吴文藻对于中国边政学发展的贡献

在吴文藻进入燕京大学之前，燕园中最发达的社会学学说是区位学说，也就是和芝加哥的农业生态学最接近的学说。这一学说在 1922 至 1930 年有着非常突出的取向——成为燕京大学研究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然而，吴先生很强烈地转变了这一点：诸如帕克一类的芝加哥学派并不是他最盼望的学问，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一個转变就是希望以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准确地说是以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人类学而不是其他形式的社区研究，作为田野工作的典范。这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时间、空间和人。时间方面，他是一个典型的当下主义者，即时间在文化，而文化是活着的传统，所以他的史观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当代史的史

观。空间方面，他完整地接受了区位论，即芝加哥学派的区位论。对于最重要的元素人，吴文藻在离开燕京大学之前并没有思考清楚，如何以特别的方式来凸显社区研究中人的要素。这实际上也隐含在他更早期的工作中，即他对国族的争论。

吴文藻 25 岁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写了《民族与国家》，实际上是对西方在两战之间思想的一个重要检讨。虽然这篇文章还不是很成熟，但非常有力。因为它直接的问题是一战带来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否只能在民族建国或者民族自觉中予以体现？它背后的问题是同一个民族国家的建国，在勒南到威尔逊的传统思想中，其实是体现得非常不充分的。此后在 1926 年的文章中，吴文藻曾以王道精神来概括中国的部分。1938 年，他在美国时，正好处于学术休假阶段，于是去了欧洲，期间拿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当时没有出版的手稿《文化表格》。由于这篇文章此后没有再发表，所以他拿到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版本。吴文藻当时在评未刊稿的过程中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就是《论文化表格》，他以中华文明来重新替代王道精神，但这时他的思路变得更加清晰。在吴文藻看来，20 世纪伟人统治观念和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实际上是促进边疆文化理解的两个最主要的知识系统。中国活在这两个知识系统的中间，有没有可能完成自己的转变，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把他心目中的王道精神或者中华文明充实成一个新的边政知识学说，是他 1938 年离开燕京大学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努力方向。

同时，吴文藻在这一时期也有两个重要认知：第一，一

战之后新的国际主义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第二，从荷兰开始，殖民帝国一个重要的发展在于以科学而不是经验的方式来强化对殖民地的处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吴文藻还是马长寿、刘咸等学者，对从荷兰开始的以科学孕育殖民统治到在澳洲和剑桥培训殖民地官员的一整套知识形态都有着极大兴趣。他们认为，委任统治的实现，仰赖于这套在殖民地已经实现了差不多近 100 年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二者有紧密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是，功能主义的人类学在英帝国殖民主义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从 1857 年开始，这种间接统治开始正式走向了英帝国的统治核心，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自由主义帝国时代以文明化使命为核心的统治方式。统治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重新塑造什么是习俗，而且要把它推向因俗而治这样一种统治形式的核心。第二，需要把殖民知识体系彻底人类学化。

• 间接统治思想：从梅因到马林诺夫斯基

在梅因设计的因俗而治的殖民帝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缔造传统社会，也就是将殖民地塑造成一个文明意义上的传统社会。这是梅因在古代法，包括他就印度一系列的演讲中强调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社会的建构对梅因来说，最重要的角色不是传统社会掌握文化资源的贵族，而是像他一样，对殖民地文化抱有强烈的理解能力和所谓同情心的帝国知识分子。他在塑造传统社会时一个关键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古石社会和初民社会两种形态观之间的间隔。因为在塑造传统社会时，初民社会实际上是不开化的社会，即在文明

观上是野蛮的社会；而古石社会则会将遭遇殖民帝国统治的社会视为古代风俗语言习惯和法律传统的遗存，也就是古文明的化石，二者在理念上有非常明显的分歧。实际上，梅因在思想史上是三个关键转变的交汇点：古石社会的重新发现、英帝国的间接统治和对印度留存的早期社会习俗的改造。梅因第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一定要打破维多利亚时代将习俗思维视为阻碍自由实现的障碍。在他看来，习俗不是那些占据文化资源的贵族，比如婆罗门手中掌握的文化代码，而是像他一样掌握了现代学科工具，能够重建习俗、重新收集习俗，能够恢复习俗本来面貌的一群学者和科学家。习俗不是本民族的精英所掌握的，这是他观念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有了这个转变，他能够有力回击维多利亚时期将自由和习俗分开的观点，并将此前被忽视的一系列的材料和档案，比如政府官员的管理文书等等，纳入到重建习俗的核心之中。

梅因这个观点背后，实际上是对英国殖民统治产生了重要的怀疑，即西方化或者文明化的本地人是否能够担负帝国统治代理人的角色？他对这个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评。换言之，梅因发现在 19 世纪 60 年代时，对于帝国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本地人。通过文化的输入和持续的同化，将殖民地纳入到和本邦一体的文明秩序里，在梅因看来是一个非常悲观、不可能实现的道路。文明化、同化和自治三位一体的统治格局，在梅因看来是非常有问题的。他认为，习俗的背后实际上是强烈的、甚至是不可逾越的分治界限，所以习俗的话语表面上虽开放，实际上却强化了这种不可同化的界限。在这一点上，他比伯克的观点有过之而

无不及，尽管他对殖民地的重视要比伯克强烈得多。因此，这样一种分而治之的形态，一种认为同化没有出路的思路在20世纪初最终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开放性与正当性开始结合起来。不过，大家忽略了它的保守根源，即间接统治的背后，恰恰是不认可或不相信文化多元能真正实现的基本态势。

梅因强烈地反对把殖民地的习俗看成是一种不文明的民风，并且走向它的反面。他认为初民社会的迅速瓦解才是危及帝国统治的根源，而不是相反。所以梅因缔造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分离殖民和被殖民社会之外，保证初民社会的习俗，从而使之有序地发展下去。田耕认为，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理解的古代法表面上像是一个二元论或者是社会形态的进化观，但其中却蕴含着一个特别精彩的部分，即在法律拟制的部分，我们会看到梅因讲父权制不是初民社会或者是古代文明遗留下来的，而是拟制意义上的父权制。他关心的核心是，父权制的强大在于能够把非家族的成员纳入到父系血统的统治下，这是父权制的真正力量。所以，他强调的家庭是基于拟制上的家庭，他强调的血缘是基于拟制上的血缘，他强调的父权是基于拟制上的父权。也因此，基于法律拟制的父权制，被他用来重新作为古代文明的核心。

梅因和他同时代的古典学者，譬如库朗日，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古代社会的形态在他看来是拟制意义上的形态。这种情况下，它的背后始终有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立法者。在梅因那里，首先是要改变采风问俗的手段。这意味着将民族制的习惯证据置于形成久远的传统之上，把对习惯的法典

化置于本文明基因才能掌握的典籍之上。对梅因来讲，真正意义上的用习俗治理印度，不是婆罗门手中掌握的印度传统，而是英帝国在印度科里发的那些法典和依据这些法典进行断案的法庭。所以梅因转向了他真正试图要拔高的殖民地档案方志和行政报告，正是这些东西将习俗从仪式转变成为社会结构。

在梅因的理论影响下，19 世纪后期的英帝国殖民官员，包括代表英帝国在欧亚不同地区担任殖民总督的官员，进一步发展了殖民统治的技术和方法，对自由主义帝国两大核心的观念代表和主权提出了根本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因掀起了间接统治的一个重要的转变，被殖民的地区有了新的身份。借用国际法史学者的概念，在梅因之后，殖民地是以不平等融入的方式进入世界的体系，而不是被殖民帝国支配的方式。这一点成为此后马林诺夫斯基一代思考阶级统治的契机。马林诺夫斯基 1920 年初回到欧洲后，开始思考这一时期英帝国代表的殖民帝国的统治秩序。殖民地的传统被视为是一个复杂而精致的网，在他看来这是非常错误的。殖民统治的知识缔造者，也就是殖民官员和传教士破坏了它的整体性。所以触动马林诺夫斯基的实际上是梅因在这一个时代没有彻底完成的殖民知识人类文化的任务。他说正是这样一些不恰当的殖民地知识，正在造成梅因当时非常担心的一种危险，就是初民社会的消失。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英帝国殖民地一方面重视托管统治，另一方面又留有保留权，也就是说即使对一些传统的部落有主权，但在殖民地官员看来有损人权的做法，职能关系是有

权收回的。这无论是在英帝国还是在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法律裁决中，都有大量的例子。但是马林诺夫斯基的认识角度与此不同，在他看来，肢解殖民地传统的完整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开始，而他认为殖民地官员本身就是一体两面。他在1926年发表的《初民的犯罪与习俗》中一个核心的观点是，初民的法律就是文明法，初民的法律核心是 *civil law*，而不是 *primitive law*。为什么要实现这个转变？是因为传统的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将初民的法律视为习惯法和惩罚二合一的一种方式，即习惯法代表一种对传统的盲目服从和对传统高度惩罚的后果惧怕的集合，这是马林诺夫斯基这本书中反对的焦点。他认为应该把初民法律和现代人文明国家的法律视为同样一种民法，即本邦法。这个定义和梅因在《古代法》第三章中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法律就是他人对自己的正当要求，这个正当要求的核心是管理的义务。法律的焦点，不是他的前辈们包括涂尔干所认知的那样，是盲目服从习惯和惧怕惩罚。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不应该再用习惯法来概括初民社会的法律，也不应该用所谓的理性来概括现代人的法律。这种做法不是为了使初民社会和我们的社会一样高度的理性或者具有同样的理性，而是为了把存在于初民社会的仪式，也就是巫术系统变成理性秩序的一部分。这是马林诺夫斯基在这本书中的一个重要运用。

马林诺夫斯基写这本书时，即1922年至1936年之间，国际联盟受梅因的影响，通过隔绝维系殖民地的原貌，通过分而治之维系殖民地习俗和文化的完整性。但这样一种以部落为基础的领地统治，马林诺夫斯基是强烈反对的。马林诺

夫斯基看到了当初梅因笔下阶级统治关键的一点，即传统社会无法西方化。他鲜明地提出：人类学今天真正的任务是文化接触，而不是分而治之，是文化接触当中的知识问题，而不是因俗而治当中的知识问题。所以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梅因虽然开了头，但没能实现的一步，需要功能主义人类学才能够极大推进。简言之，就是坚决以文化接触研究作为人类学全部的知识核心，而不是探求任何意义上文化的原貌和文化的源头，或者是原初意义上的文化组织。

因此，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人类学，是一个以研究文化中间地带和文化接触为使命的科学。对他来说，不是应该保护习俗，而是应该研究文化接触。这一点实际上是被从吴文藻到费孝通等一系列中国学者所深刻认知的。费孝通在和顾颉刚、傅斯年论辩时，他潜在的理论依据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的研究。所以他的史观也贯彻了马林诺夫斯基对文明接触或者文化接触的理解。马林诺夫斯基说：间接统治是根本没打算自治的间接统治。只有认清楚这一点，才能够看到人类学在当今的重要意义。此外，弗雷德代表了要被马林诺夫斯基革命的这部分人，就是把习俗变成古典，即习俗的古典化。因为弗雷德对《圣经》和东方文明精神的研究，实际上是要把习俗强烈地返回到 19 世纪以前的古典知识系统的形态。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虽然他非常尊敬弗雷德，但这一步是无论如何要跨出的，习俗要来自西方人自己。

马林诺夫斯基生前相当悲观的一点是，间接统治只是一个没有出路的中间状态，且已经到了尽头，其能够持续的未来就是自治。但是这个自治到底是文化自治，还是民族主义

真正在全球的爆发，也就是他笔下所谓的武装斗争的民族主义，马林诺夫斯基自己对这一点则显得非常悲观。因为他并不希望看到最后这一点，而是希望将自治维持在文化自治上，但这是非常困难的。而马林诺夫斯基笔下不确定的这一点，恰好是中国边政学中一个非常早熟的批判中要看到的出路。

总体而言，一战后国际政治有两个激荡的趋势：民族建国和委任统治，前者强调自觉，后者反对文明化的理想。实际上它有着一体两面的趋势，在这个趋势之中，间接统治达到了它所能实现的最大的政治能量。将习俗变成古代社会的路子不会完全走下去，这是马林诺夫斯基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评，也是对民意的继承。换句话说，习俗的核心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古代文明的遗存，而是文明接触的现实。马林诺夫斯基洞穿了间接统治的最后一层窗户纸，接下来是会走向他心中只有文化而没有政治的自治趋势，还是民族主义的大爆发？吴文藻等中国学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思考中，实际上是看到了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尝试点，就是接续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即文明接触一定是边疆或边政学研究的核心，但它未必是马林诺夫斯基所悲观的武装斗争的民族主义。梅因提出了间接统治，马林诺夫斯基挑战了间接统治，而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学者的边政学，则是希望走人民接触和多民族整合这样一条道路，所以它是代表了第三波发展。

解耦 OR 脱钩：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为何渐行渐远

2021 年 6 月 11 日

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都是冷战时代的“美国制造”。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曾有过 30 年相互参酌、交织发展的“蜜月期”；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双方在知识诉求、学科定位、核心关切、研究手段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促进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互动兼容，但迄今为止进展不大。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这种明显的 **Decoupling** 趋势到底是“解耦”还是“脱钩”？一语改易，映像遽别。本期沙龙邀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汪卫华副教授，从这个小词出发，探讨从比较政治或区域研究各自的立场出发，会呈现出怎样不同的知识愿景，进而对于中国自身的世界政治与外国问题研究又意味着什么。

汪卫华表示，**Decoupling** 这个词最近非常流行，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惦记着要与中国“脱钩”，而“脱钩”本身在金融和经济领域是固定的一种译法，它所描述的状态与火车脱钩其实是一回事。这里的基本预设是，中美是相互联系的两个实体，它们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电子电路和软件工程两个学科也有这个用法，电子电路把它说成“去耦”，软件工程上叫“解耦”。这些表达源于“耦合”，是指两个实体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而影响的程度称之为耦合度。其中

预设的前提是两个实体虽然是各自独立的，但它们构成了一个系统，追求的是这个系统本身能否有效地、稳定地运作。软件工程通常将“耦合”分成7级，耦合度越高，模块相对的独立性就越弱，互相干扰的程度也越高。软件系统设计追求“高内聚、低耦合”，要求各个成分呈现为一个模块式的分布，然后在调取时，既可以调取到它需要做的事，又能降低整个软件系统的耗能，使它的稳定性增强。总之，Decoupling是一个英文单词，但在将它翻译成中文时，“脱钩”是对它的一种想象，“解耦”是另外一种想象，两个词并举，意在隐喻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之间客观上渐趋疏离的状态。

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一个系统？首先二者在研究外国问题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然而，今天比较政治研究走向了理论叙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是地理区域，并承载了一定的文化意义，但在具体操作时，它的分析单位是很模糊的，有区域、国家，甚至还有文明。其次，区域研究自诞生起，就强调自身多学科、跨学科的属性，但换一种理解，多学科不就是因为反学科吗？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关切和用什么方式来研究这个对象，是两个问题。如果强调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研究对象，那么可以说这是学科性，但若不强调这个方式，则意味着所谓的反学科，它就是对象导向的。第三，区域研究中大家都在做不同的事，不同区域各自关心的焦点也不同，那么在原理论层次上，区域研究谈不上有统治性的方式方法。此外，就中程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而言，区域研究在社会科学主流看来理论贡献很少，相对于比较政治系统的理论导向和知识概括来说，区域研究

其实是很混乱的，存在比较明显的争议。

耦合：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早期的携手并进

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60 年代末，是携手并进的状态，可称之为“耦合”。二者都是美国制造的研究领域，并非什么学科。

现实动力上，美国在二战后的全球利益关切，直接促使它将资源投入到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之中，并决定了今天所熟悉的区域划分实际上建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其次，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兴起时，有一个重要的、取得共识的知识背景，即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它有重大的意识形态意义，就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想象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版本，尤其是五大阶段论的版本，这是两种人类发展的史观。在这个语境下，区域研究和比较政治在理论层面上的共识就是现代化，两者围绕这个主导范式展开了早期合作。

从建制化的角度来讲，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都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有意识构造出来的。区域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报告是 1947 年 Robert Hall 主笔的《区域研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它直接规划了未来区域研究到底应该怎么做、重点在哪、如何划分区域等问题。随后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ACLS）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合作，在上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共同组建了若干区域研究委员会。另一方面，受政治行为委员会运作极其成功的鼓舞，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白鲁恂（Lucian Pye）等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成立了比较政治委员会，而该委员会是推动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科学化转向的关键性学术机构。

早期携手合作的知识背景，是原理论层面上的共识。阿尔蒙德将结构功能主义作为构造其比较政治理论的基础，而结构功能主义对于所有以社会学、人类学角度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而言，是很容易接受的。在美国学科发展史上，行为主义革命是与美国政治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比较政治在早先的 20 年中与行为主义没有关系。而结构功能主义实际上通常是宏大叙事、很宽泛的东西，它与美国政治的距离越远，与区域研究的距离就越近。

代表性成果方面，早期比较政治的理论架构，其实与当时对亚非拉第三世界的研究没有什么关系。阿尔蒙德 1956 年的论文，李普塞特 1959 年的论文，还有多伊奇 1961 年的论文，作为最早的一批研究成果，奠定了政治学学科从现代化理论角度谈论政治发展问题的基石。它以符合系统论的语言梳理了欧洲和美国早期工业化的经验，分析了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勾勒出一个从比较政治、政治发展的角度切入到政治现代化问题的大体模板。这个模板真正成型的标志，是 1960 年阿尔蒙德和科尔曼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阿尔蒙德在导论中比较系统地提出功能主义观点，但结构色彩还不明显，后面每一章则介绍一个地区的政治状况。这其实构成了一个最理想的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深度融合的方式，就是前面有一个理论框架，然后用同样的理论框架，分区域分析不同的地区或重点国家。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理论导向的比较政治研究和区域研究之间早期耦合的程度是较高的，二者至少有对话空间，互相能有所启发。1963 年，白鲁恂接任比较政治委员会的主席，连续编了九卷本的《政

治发展丛书》，其中大量具体议题有区域研究的支撑。1966年，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发展研究路径》，基本上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发展研究和早期的比较政治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的系统总结。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虽不在此系列中，但理论风格与结构功能主义也是一致的。这一套知识体系的存在，意味着在上世纪 50 年代早期到 60 年代，基于区域专家、比较政治理论家的合作，一套比较完备的话语系统已经构成，其核心就是现代化，重在解释政治现代化是怎么回事，应该做什么工作，应该怎么去想问题。

上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比较政治的理论兴趣发生了重要转向，标志性的信号是 1971 年罗伯特·达尔的《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达尔是典型的美国政治出身的政治理论家，但这本书给现存的世界政治中的各种政体形态做了新的类型划分，并很快为大家所接受。这意味着行为主义的操作程式在影响着比较政治，而且将原来美国政治中的民主问题导向，非常生动地渗透进比较政治的研究领域。

简单概括，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耦合的基础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同样的愿景，即现代化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其次，原理论共识是结构功能主义。第三是知识论上的诉求，即包括区域专家在内，大家不满足于只做描述，还想要做些理论解释，但到底是什么理论或怎样去发展理论，却都有点茫然无知。所以这个时期，做的最出色的一类工作是做分类，而不是解释因果关系。第四，政治学在方法论上还不自觉，正是因为它落后，所以大家能够共荣。

解耦：方法论自觉拉开了政治学与区域研究的距离

汪卫华指出，上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政治学与区域研究关系的定位是解耦。解耦的动力很简单，就是比较政治开始有意识地与区域研究拉开距离。原因有四条：第一，逻辑经验论主导的科学观基本上在政治学内部确立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追求一般化的理论成为政治学科的核心任务。第二，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面临着美国政治研究量化方法的巨大压力，跨国比较代替国别研究成为业内研究的主要关切。第三，问题意识的转向。越战结束，拉美和南欧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民主化逐渐取代现代化成为比较研究的核心关切。第四，共产主义运动自身的分裂，反衬了社会科学原理论问题不再那么重要。

比较政治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自觉发生在上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之间，由此政治学与区域研究关系呈现出高内聚低耦合。高内聚是指在政治学科内部对话，低耦合是指尽管政治学研究外国问题，但与区域研究要拉开一段距离，因为自身方法论标准的提升，而区域研究基本上仍是无政府状态。

高内聚低耦合的学术转向，意味着比较政治研究开始从早期的关注亚非拉变成关注自己。上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大量理论贡献是通过重新梳理欧美经验、重新认识拉美来展开的。明显的表现是：第一，政治文化研究在这个阶段基本上相对沉寂，处于所谓的“数据积累期”。第二，欧美之间重新梳理经验的跨国比较变得突出，其中最成功的合作就是李普塞特和罗坎在 1968 年集合一批做政党政治研究的学者，

建立了一个延续至今的关于政党政治的基本分析框架。第三，拉美和南欧形势的变化，让政治学主流开始重拾“李普塞特命题”（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并聚焦于精英之间的互动，以及具体的民主化转型过程。第四是方法论的成熟，比较政治领域标志性的方法论教本是 1970 年亚当·普沃斯基和亨利·图纳合著的《比较社会调研的逻辑》，其中最相似系统和最大差异性系统的比较方法延续至今，成为比较政治的基本功。此外，统计技术发展，博弈论也进入成熟期，方法论的个体转向开始出现。

上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区域研究圈子中有两次有意思的争论，引起了比较政治学的关注。一次是围绕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的“斯科特—波普金争论”。这个基于东南亚小农的区域研究争论为什么引起比较政治的广泛关注？实际上，比较政治学者关心的不是区域问题，而是关心农民问题，以及其中存在的方法上的创新。哈佛大学教授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也曾遭遇区域研究专家几乎一致的批评，但她表示，自己要回答的主要是关于革命的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这个研究开始，比较历史分析重新回到主流立场，结构化的比较历史分析可以用来操作宏观的历史现象，并在中间提供一个因果关系的回答。这两次争论的共性是在区域研究或者带有明显的地区国别背景的知识的答案上，如果有广泛性的、一般性的议题存在，加上方法上或者研究思维上的创新，很可能就会为比较政治的学者所关注。

为什么会发生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的解耦？解耦的基本语境是什么？第一，大家意识到，知识诉求方面存在根本

分歧。比较政治始终要回答一个通则式的、一般性的理论问题，最重要的经验研究材料是拿来检验理论的。而区域研究更强调一个特例式的、地方性的知识，呈现差异性本身就是区域研究最值得追求的东西。第二，学科的内部竞争。作为具体的从业者，到底是去跟学科对话，还是跟区域研究专家对话，得有个取舍。上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不仅在政治学，甚至在社会学、人类学，所有的学科建制化的学者都面临着两难，就是越来越多地要与本学科的学者对话，而不是与研究区域的学者对话，由此各自走向了某种程度上的高内聚。第三，学科之间的反衬。冷战突然终结，在区域研究领域给传统苏联东欧研究造成毁灭性打击，区域研究的知识整体上面临较大的挑战。相对地，这一时期经济学帝国主义抬头，直接对比较政治和政治学造成整体性冲击，理性选择和形式模型大量进入政治学的研究中。在这一反衬的基础上，比较政治选择向进一步科学化的方向走去，认为这种赌博是对的。

脱钩：比较政治方法的标准化导致区域研究价值的贬低

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确实出现脱钩的趋势。比较政治开始刻意地与区域研究拉开距离，并开始自我抬升，认为区域研究不科学。从客观环境看，整个时代氛围变了，冷战以苏联的自杀终结，美国失去了对手，社会科学话语系统不一样了。自由主义指导的全球化似乎在拉平世界，要给予普适性的解释。东亚金融危机给了区域研究

在理论贡献上最后的致命一击，给发展型国家叙事带来沉重打击。此后，在比较政治话语体系中，再没有从区域研究背景中生发出来的理论解释了。

另一方面，政治学自身的标准化运动，尤其是《设计社会调研》出版后，基本上量化学者想一统江湖，政治学内定性的学者希望不断去辩论，在方法上换一套说辞，使其更有趣一点。这个时期有一个特例，就是罗伯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它基于一个国家的长期研究，为所有政治学从业人员提供了一个谁也无法忽略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巨大刺激，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复制的成果。

1996年，非洲研究专家罗伯特·贝茨作为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比较政治组主席，发表一篇主席信，声称区域研究可以归到历史学行列，比较政治不要玩这套东西，实际上意在实现两者间的某种“调和”。1997年，《高等教育纪实》的记者报道了这件事，使其成为政治学中争论的焦点，大家认为贝茨背叛了区域研究并试图用形式模型的标准去改造比较政治。四年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匿名邮件事件，引发了比较政治内部区域背景的学者和坚持量化或形式模型导向的学者之间更广泛的争论，但结果不了了之。

这一阶段，区域研究基本上置身于政治学20年方法论的论战之外。区域研究学者并非没有回应，一种回应是与量化研究保持距离，坚守诠释论、建构论立场，强调理解一致性。尤其是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立场出发的学者，更容易做这个选择。另一种回应是以斯科特为典型，重新界定区域研究对象。传统的区域虽然叫区域，但实际上关心的是基于地缘

政治架构的区域，以及空间里的人与社会。一些学者从地理学家那里受到启发，因为地理学中有区域科学，强调人和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能否换一种划定区域的思路，从议题主导的方式重新想一套问题，并回答这套问题。最为人熟知的研究是斯科特对赞米亚（Zomia）的研究。还有一种方式最近刚刚开始抬头，就是比较区域研究。传统的区域研究一般是对个别区域、国家的讨论。是否有可能既对区域保持敏感，又借鉴定性研究的方法转向跨区域的考虑，来参与一般性理论的对话。如果要做跨区域的比较区域分析，在方法上要自证其明，同时还要明白这个区域的特性。尽管学界最近在呼吁，但是到现在，没看到特别让人眼前一亮的成果。

保持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低耦合”

汪卫华认为，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之间解构在所难免，脱钩全无可能。解构为什么在所难免？第一，学科是基本单位，归根结底要从学科内往外看，不可能真的站在学科外部往里看。第二，原理论的共识在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中不存在，没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就没有沟通的平台。第三，知识诉求的立场分歧是很难调和的。最后是方法论的标准问题，这涉及到一系列两难的取舍。因此，现实中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做政治学的人在理论方法和区域国别之间，顶多照顾两头，要把三方面全照顾上是不太可能的事。

脱钩全无可能，这是现实的需要。第一，没有国别知识作为支撑，比较政治就是无源之水。第二，与政治学自身的知识定位有关，它毕竟是一个实践的知识、实践的智慧，因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三，处境化的分析，把处境带

回到因果解释之中，这个在所难免。区域研究最重要的是强调处境的特异性对一个具体结果的影响，而特异性就意味着启发性，刻板印象可能被突破。

汪卫华指出，中国的区域研究最理想的状况应是追求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之间的低耦合。第一，要解放思想。从中国立场看问题与从英文语境看问题，问题意识是不同的，要先考虑到中国区域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议程设置。第二，要实事求是。现在的区域研究基本上是全覆盖，但是否存在着着力点？比较政治在中国最大的缺失究竟是方法上的还是认识论上的？如果大家都有问题，那应该怎样共同促进？这中间的接口在哪里？第三，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区域研究需要去了解比较政治，尤其要了解为什么比较政治一定要回答一般性的理论问题。比较政治也不用只顾着似是而非的一般性经验理论的检验，还有很多启发性的工作可做。

在具体研究中，语言上的分歧一定要注意。中文的思维方式之所以很难理解所谓的逻辑经验论这一套科学思维，跟语言有着密切关系。在做区域国别研究时，中文和英文频道之间的转换，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可以暂时搁置，但不能一直回避。还应保持客观中立，不能基于上帝视角。最后，比较政治研究和区域国别知识还是要由己及人，站在中国的立场去建构这套知识体系。

主题报告后，与会人员就报告内容进行多花与讨论。

雷少华：我有两个方面的思考：第一，冷战背景下，美苏在一定程度上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去殖民化，但路径不太一样，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强调先制度化，

再讲政治参与，这背后似乎隐含着一种立场：把工人农民动员起来的是共产党，但不如先依靠蒋介石、朴正熙把秩序稳定下来。第二，区域研究在学术研究中的热度，也许是因为某个地区经济发展非常快，或者是闹大革命。但是引发关注本身和它是否能贡献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是两回事。

汪卫华：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兴起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证明现实的合理性。不要想着闹革命，通过点滴改良好日子也会来，这区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这个压力之后突然降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和苏联闹翻了，苏联希望维持现状，中国希望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革命。在这个反差中，没有任何一个做政治学研究的人会主动承认自己有意识地要与时代风气接轨，但是客观上外部压力就是存在着。美国二战后的社会科学有一个价值立场的基本共识，就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是主流。在这个基础上，构造了基本上使大家可以对话的一套机械性的知识框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学说和中国的世界革命学说，主要是关于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憧憬，然后如何去实现这个憧憬，是另外一套话语系统。两套意识形态的建构路径方向是反过来的，这也影响了比较政治学科的知识建构。

关于第二个问题，所有的比较理论知识都是基于具体经验的普适化表述，具体经验一定来自具体的区域和国别经验。但什么时候这种基于具体经验的普适化表述能够被学界广泛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如果有规律性的话，必要条件可能是这个学科内部关心的核心问题。

施越：能否展开讲讲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差异？

汪卫华：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概念化基于分类，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它就不是另外一个东西，这是分类最基本的特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易经》开始，阴里有阳，阳里有阴，是一种包含关系。主谓结构是理解西方语言和逻辑思维的基本前提，而中国语言不强调主谓结构，名词和动词之间都是不清楚的，不需要通过变形表示它的词性，中国在概念和范畴的界定上，特别强调包含关系。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直接影响概念界定工作以及构造的范畴。但这样一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只要用中文写，就很容易发生逻辑上的问题，以及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词语的理解上有分歧，于是就不得不地加括号、加英文才能表达。只有在双语频道上，才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谢侃侃： 汪老师所说的区域研究是广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还是指政治学眼中的区域国别研究？广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之间是否是模块的关系？是不是耦合的关系？我认为区域研究和学科更像是同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的两个 **identity**，都有自己非常重要的学科根基。相对来说，区域研究并没有非常名正言顺的学科归属，比较政治是在政治学学科内。也许区域研究在人类学或是在历史学中从来没有消亡过，但它在比较政治或是政治学非常特殊的学科语境下，在上世纪 70 年代有消亡的趋势，甚至在 90 年代给人一种凋零的感觉。

汪卫华： 首先，我理解的区域研究，原初意义上是 **Robert Hall** 当年在社会科学理事会的报告中的定义。它是从人文学科里生发出来的，但不满足于人文学科，希望促进人文学科

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让它跟社会科学对话。从学科的角度，我倾向于认为，区域研究不能完全退回到人文学或历史学的状态，否则它跟社会科学对话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区域研究可以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科，但需要澄清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与一个学科有什么区别。第三个立场，我将比较政治当成一个领域，而非一个学科。我觉得比较政治到今天越来越恶劣，与它太在意自己的学科属性，以及要跟学科主流对话有很大的关系。我不太希望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之间过分疏离，而是能够作为两个知识模块保持一种低耦合的状态。